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由冯友兰的哲学道路谈起

郁有学

提 要 冯友兰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哲学探索,为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制作,都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哲学也一定要回答新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2)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民族特色,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哲学,一定要用民族的语言,接着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问题往下讲。(3)21 世纪的中国哲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指导下,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基,以西方哲学为营养,在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中重建并复兴。

关键词 哲学 中国哲学 冯友兰

冯友兰一生的哲学活动,始终是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进行的。其具体的演进过程是:由哲学学习(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入哲学史研究(英文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哲学史研究尝试着进入哲学创作(《一种人生观》)。这是 20 年代初期。到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他又在更高的起点上,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接着在 40 年代又转而从事哲学体系的创立。40 年代末又由哲学创作复归于哲学史研究(《新原道》和《中国哲学简史》)。这是冯友兰哲学活动的前期。

在五、六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此进入了哲学活动的后期。这一时期的演变过程,也是由哲学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经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进入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这是五、六十年代。进入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冯友兰又由哲学反思,实现自我超越,重新进入哲学史研究(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新编》的最后一章,即八十一章,冯友兰所重点阐发的哲学问题,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来论哲学的性质、作用以及世界哲学的未来,这又进入了哲学创作的领域。

上述演进过程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由哲学史研究(《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进入哲学创作(《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新知言》),复归于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上述演进的过程中,冯友兰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轻易地克服了王国维式的困惑(“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成功地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从而使他的哲学创作,“富于哲学史意义;其哲学史著作,富于哲学意义。”(涂又光先生语,见《当代中国十哲》246 页)这也就是说,冯友兰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从

而使其哲学史著作富于哲学的意义；他又从哲学史家的立场，来处理哲学问题，构造哲学体系，从而使他的哲学创作，立于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民族色彩。这样一来，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就成为冯友兰之为冯友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

冯友兰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哲学探索，时间长达 70 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哲学生涯中，多的是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失败的教训。

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哲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仅就其成功的经验来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创作，都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

冯友兰正式开始哲学活动的 20 年代初期，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的所有“好学深思之士”都希望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给出自己的答案。冯友兰也是带着这个问题，而于 1919 年冬赴美国留学的。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冯友兰想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中西文化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如何解决由这些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试图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是冯友兰哲学活动的开始。

冯友兰的第一篇正式哲学论文就是《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认为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随着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他马上又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发现哲学是不分东西的，人的思想也是不分国界的；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所阐发的主要观点。

1923 年春夏之间，我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叫作“人生观之论战”。玄学派主张人生观问题必须由玄学来解决，科学派则认为人生观问题只能由科学来解决。冯友兰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一论战，但他却撰写了《一种人生观》的小册子。稍后，他又把这个小册子加以修改，称之为“一个新人生论”，作为《人生哲学》的最后两章。在这个新人生论中，他较系统地回答了“科玄学论战”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从宇宙的构成到文学、艺术以至于宗教，都尝试着作了一些解答，因而可以看作是对这场论战的理论总结。

1919 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从此在史学界引发了一种“疑古”的风气，其流弊所及，甚至认为古人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靠不住的。为了对治这种学风，冯友兰立于“释古”的立场，抱着同情了解的态度，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自觉地肩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成为所有炎黄子孙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时代问题。对此问题，当时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民族的振兴必须以民族哲学的复兴为先导。于是冯友兰就接着中华民族哲学的优秀传统往下讲，创立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希望以之作为民族复兴的哲学基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此后，冯友兰给自己提出的哲学任务，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其哲学含义，就是把

中国古典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成分阐发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创建提供营养。

由以上的分析叙述可以看出,冯友兰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创作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时代的要求,其目的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哲学也一定要回答新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

第二,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民族特色,作为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在创立其哲学体系的时候,一定要接着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往下讲。

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冯友兰常举这样的例子以为说明:德国哲学与德国化学。他认为德国化学,其意是说德国的(此“的”字表示所有格语尾)化学,也就是在德国的化学或者化学在德国。而德国哲学,其意是说德国底(此“底”字表示形容词语尾)哲学,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是与其他民族的哲学不一样的,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这个意思用一句简明的话表达就是:“哲学或文学可以有民族的分别,而科学则不可以有。”(《全集》五卷,306 页)

但是冯友兰也承认“哲学中有普遍底公共底义理,至少其目的是在于求如此底义理。这些义理,固亦须用某民族的语言说之。但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科学是一样底,至少应该是如此。”(《全集》五卷,308 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哲学义理本身的角度来说,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没有民族的分别。

既然如此,那么哲学的民族特色又是从何而来呢?对此,冯友兰说:“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某民族哲学之所以不仅是某民族的,而且是某民族底,其显然底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语言说底”。(同上,309 页)这些分别,就哲学说,是表面的、外在的、不重要的;但就民族说,是内在的、很重要的。

这种内在性和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对此,冯友兰指出:用某民族的语言,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所讲的哲学,“能予某民族以情感上底联想及情感上底满足。因为所谓接着某民族底哲学史讲哲学者,事实上即是接着某民族的以前底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某民族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面底领导者。某民族的人,见了这些领导者的名字,接触了他们的思想,自然有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满足及精神上底团结”。(同上,316 页)

因此,一个哲学家,仅就其是哲学家说,他接着任何哲学史讲,用什么语言说,都是没有关系的,“但就其是某民族的哲学家说,他必须接着他的民族的哲学史,讲他的哲学,以他的民族的语言,说他的哲学。……如此说底哲学,不论其内容是那个派别底哲学,它是此民族的民族哲学”。(同上)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必须从其旧民族哲学中“生”出来。

冯友兰自己的哲学创作实践,就是他的这一民族哲学理论的成功范例。他的新理学体系,虽然受新实在论哲学的极大影响,但由于它是以接着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正统学派,即程朱理学的名义往下讲的,而且是用地道的中国语言表达的,所以它就是中国的民族哲学,而不是新实在论哲学在中国。这一体系刚一问世,就被看成是民族哲学复兴的先兆,被看作有一股民族复兴的气运在涌动,就是对这一体系的民族特色的承认。

在《新编》总结中,冯友兰在论述哲学的性质、作用以及世界哲学的未来的时候,特别声明是接着中国哲学的传统来谈,其目的就在于彰显哲学的民族特色。

第三,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创造未来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

冯友兰一生的哲学活动,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有力证明。20 年代初期,他的《一个新人生论》就是以儒家哲学观点为主,“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糅为一篇”,而提出的一个自认为是“较对之人生论”。(《全集》一卷,509 页)30 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运用新实在论关于共相、殊相之划分的“两个世界”理论以及在西方哲学史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分析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成功范例。同时,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该书对其基本框架的设计,也以有关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作为参照坐标。

40 年代,他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就其方法说,是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法和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体认的方法的结合;就其内容说,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中国的神秘主义(即“承认有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者”)的结合。新理学的文化论,提出了一条以“工业化”为关键的“中国到自由之路”,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其内容见于冯友兰的《秦汉历史哲学》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中的某些观点的结合。50 年代之后,冯友兰在哲学上的追求是尝试着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某些新理学的观点与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哲学观。这个新哲学观的基本轮廓在《新编》绪论及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已较为清晰地显示出来。新理学是用中国的语言,接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往下讲的哲学,因而它是中国的民族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也属于西方哲学。因此,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仍然属于中西哲学结合的范畴,是冯友兰中西哲学结合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冯友兰终生致力于中西哲学相结合的哲学探索告诉我们,未来的中国哲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观点的指导下,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基,以西方哲学为营养,在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中重建并复兴。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744 页)这是冯友兰的伟大遗言,也是我们的坚定信念!

新书架

- 《孔子与中国之道》【美国】顾立雅著 高专诚译 2000 年 大象出版社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英国】葛瑞汉著 程德祥译 2000 年 大象出版社
 《〈周易〉与二十一世纪》徐道一著 2000 年 9 月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一个中国与中美国际关系》谢正一著 2000 年 3 月 台湾华威文教事业有限公司
 《中外文化交流史》马树德著 2000 年 12 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汉学研究》第四集 阎纯德主编 2000 年 1 月 中华书局
 《汉学研究》第五集 阎纯德主编 2000 年 5 月 中华书局
 《国际汉学》第五辑 任继愈主编 2000 年 6 月 大象出版社
 《国际汉学》第六辑 任继愈主编 2000 年 12 月 大象出版社